

当代中日经济研究

晏智杰

编

——
95 中日经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日经济研究

——95 中日经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晏智杰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日经济研究:95 中日经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12

ISBN 7-301-03179-3

I. 当… II. 晏… III. 对外经济关系:中日关系-研究-国际会议-文集 IV. F125.531.3

书 名: 当代中日经济研究

著作责任者: 晏智杰 编

责任编辑: 刘灵群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179-3/F·0239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印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22千字

1996年12月第一版 199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8.00元

前 言

1995年10月26—28日,北京大学举行了高层次中日经济国际研讨会。在为期3天的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及日本学术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共80人围绕着中日经济关系、21世纪中日经济合作前景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趋势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这次研讨会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赞助,是中日学术和文化交流不断得到发展的又一次具体体现,也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建院10周年和现代日本研究班成立5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提交大会宣读的许多论文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两国实际经济进程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在两国学术界和经济界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推动两国文化学术交流,巩固和推广这次研讨会的成果,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并根据研讨会举办者原先达成的协议,决定从大会论文中精选一部分汇集成册,奉献给中日两国读者。

编 者
1996年元月

目 录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中日经济合作·····	晏智杰 成 峰(1)
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	傅骥元(24)
中国国有企业的困境与制度创新 ·····	睢国余(33)
到本世纪末中国对日本的外贸总量简析 ·····	刘 伟(44)
美日贸易失衡的原因 ·····	王俊宜(49)
研究日元升值时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	王建华(63)
世界システム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 ·····	佐藤誠三郎(74)
中国の経済改革と日中経済協力 ·····	松本繁一(84)
新時代のアジア太平洋経済·····	下村恭民(113)
日中関係の新階段·····	高木誠一郎(119)
環境保護と中国の経済発展·····	荒山裕行(127)
中国の地域経済格差と経済改革·····	丸屋豊二郎(147)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中日经济合作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成 峰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进行了 16 年。16 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9 年至 1993 年,GNP 年均增长率为 9.3%,人均 GNP 年均增长 7.8%;三次产业均有长足的进步,以 GDP 的年均增长率而论,第一产业为 5.1%,第二产业为 11.1%,第三产业为 9.8%;^①1994 年中国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GDP 达 43800 亿元,年增长 11.8%,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3.5%,第二产业增长 17.4%,第三产业增长 8.7%。^②这样快的发展速度,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都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经济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如农业基础薄弱、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通货膨胀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靠我们自身的努力,而且也应当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这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必然要求。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中日两国就有着悠久的友好往来史。在 16 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日本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中国每年实际利用的外资总额

来看,日资所占比重一直很高,尤其是1985—1988年高速发展时期,日资比重均在30%以上。^③随着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蓬勃发展,中日经济交流必然不断加强。

本文拟就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和特点、现状、前景以及日本的发展经验等四个方面进行如下的分析和阐述。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和特点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中国16年来的经济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改革初期、全面展开时期、治理整顿时期和加速进行时期。

(一) 改革初期(1979—1983年)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吹响了号角,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党和国家的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中国历史也因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经济改革一直是改革的重心,改革措施即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采取农业优先的安排,首先是因为建国后长期重工轻农,使得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基础薄弱,阻碍了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其次,在当时过分集中的农业生产体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率低下,人民群众有改变这种状况的迫切愿望;再次,山西、安徽等地的农民群众曾有过自发的“包产到户”的试验,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最后,从改革的全局看,农村改革层次少,不像城市改革牵涉诸多方面的因素,因此较易突破,一旦成功,将给城市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基于上述理由,中共中央于1980年9月正式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④并决定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在随后三年中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8.3%,^⑤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7.4%,^⑥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二) 改革全面展开时期(1984—1988 年)

198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由局部试点转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在改革的初期阶段,已经进行了以京、津、沪三大城市为代表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1981 年到 1983 年,又先后在沙市、常州、重庆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这些改革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转变,要求城市工业企业改革必须加快步伐、加大力度。在这种形势下,1984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对企业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等 10 个方面的自主权作出了政策性规定,简称“企业扩权十条”。^⑦其主旨即是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调动其生产经营主动性、积极性,逐步实现自负盈亏,走向市场。在具体实施中,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即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试点。^⑧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试点的实行,冲破了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大大增强了国有工业企业的活力,促进了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从 1984 年到 1988 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7.5%,其中国有工业年均增长 10.4%。^⑨工业的迅速增长带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得同期 GNP 年均增长率高达 11.5%。^⑩

(三) 治理整顿时期(1989—1991 年)

由于前一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货币发行过多,导致 1988 年初通货膨胀加剧,^⑪从而引发了当年 3 月和 5 月南方地区的两次

抢购风潮；^⑩到8月份进而演化成全国性的抢购，使得市场猛烈震荡，人心惶惶。为稳定经济局势，9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指出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重点突出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因而进入三年治理整顿时期。^⑪

治理整顿是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但同时也付出了重大代价。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压缩过猛，使得生产滑坡、市场疲软，经济增长明显减缓，这一阶段GNP年均增长率为5.6%，^⑫比上一阶段下滑了一半多。

（四）改革加速进行时期（1992—1995年）

正当中国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指出在改革开放中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同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把改革的总体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报告使得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在全国掀起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热潮，经济改革进入崭新的加速发展时期。

从实践上看，这一阶段的改革呈现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态势，即在继续完善和深化前几阶段的改革措施的基础上，对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体制诸方面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在这5个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⑬大大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由于改革步伐的加快，这一阶段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强劲有力，从GNP的同比增长率来看，1992年为13.4%，1993年为13.2%，^⑭1994年GDP增长11.8%。^⑮

1995年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有三：其一，国有大中型

企业改革;其二,完善财税、金融等5大改革,同时坚决抑制通货膨胀;其三,继续完善农村改革,加快农业建设。

二、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

这是一个近年来备受关注,争论颇多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大的特点是符合中国的国情,从而也就具有了中国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 从阶段上讲,是逐步推进的改革

1. 对改革目标的认识是逐步推进的。在改革第一阶段,目标是“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入第四阶段,则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看来,随着改革的发展深化,计划比重消而市场比重长。

2. 改革的领域是逐步推进的。表现在:(1)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2)城市改革先从流通、财税领域开始,然后由易到难,转向企业改革;^⑧(3)企业改革由浅入深,在第一阶段只给予企业有限的自主权,到第二阶段则大范围地扩大了企业自主权,进入第四阶段,则把企业完全推向市场,让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3. 在改革逐步推进的各阶段上,注意针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短期调整。如改革初期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⑨在第三阶段专门进行了治理整顿,进入第四阶段尤其是1995年,则着重强调治理通货膨胀。短期调整的及时进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 从结构上讲,是有重点的同时兼顾均衡的改革。

1. 这种改革结构的确立,应当归功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中国是个大国,地区差异、阶层差异的存在和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在改革中谋求所有地区和所有阶层的同时富裕是不现实的。因此,只能通过“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为突破口,才能带动其他地区和阶

层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2. 从改革领域看,这一方针的实现首先体现在农村改革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部分懂生产、善经营的农户开始富裕起来成为“万元户”,并且出现了一批种粮专业户、种养专业户、运输专业户等等。这些先富起来的农户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在城市改革中,首先放手发展非国有经济部分,引进大量外资,扶植个体、集体经济,使它们在吸纳就业人员和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3. 从地区角度而言,则先开放了东部沿海地区,继之开放沿江、沿边、沿铁路线的广大地带,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对这些重点开放区域,采取了一系列的财税、金融、投资、技术上的倾斜优惠政策,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迅猛增长。以工业总产值为例,1982—1993年,东部沿海11省区的年均增长率为20.5%,^⑨毫无疑问,这些地区的先富起来,在带动全国范围的经济增长中是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和波及效应的。

这里有一个饶有兴味同时又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选择新的经济增长极。在改革全面展开阶段选择了四个特区,在治理整顿阶段开放开发了浦东,下一步是继续在沿海发展,还是移向内地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4. 从产业角度而言,也采取了有重点同时兼顾均衡的发展方式。具体而言,就是重视农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调整改造第二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从1979—1993年,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渐趋合理,1979年一、二、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31.5%、47.9%、20.6%,到1993年则为21.2%、51.8%、27.0%,^⑩保证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此外,在我国经济改革中,还注意实施了一系列的与经济改革有关的配套措施,如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国务院机构两次重

组,^②以及现阶段正深入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等。

以上我们对 16 年来我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和特点作了一个大致的回顾和分析。牢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和展望未来。因此,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分析和前景展望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

一、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

这是由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其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直到 1993 年,这一比重仍达 43.1%,在整个公有制工业中比重达 52.9%。^③从微观市场活动来看,国有企业还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载体,仍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例,它所拥有的职工人数在整个工业行业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达 67.9%,在公有制工业中占 72.7%。^④因此可以说,国有企业仍是公有制的主体,国有企业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成败。

然而,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却非常地不尽人意,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约有 2/3 处于明亏和暗亏状态,普遍存在着效率低下、设备老化、后劲不足、包袱沉重等问题。在改革加速进行阶段,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如果不能有一个大的突破,势必影响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所以我们说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

二、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主要方面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应该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政企职能分开

这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必要前提，政企职能不分开，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就无从谈起，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句空话。同时，政企职能分开也直接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变的成功与否。政企职能分开已经提了很多年，但现在仍存在政府过多干预企业，企业缺乏自主权的状况，由此所致的就必然是企业搞而不活，甚至滋生政府中的腐败现象，今年4月在北京等地所揭露出来的一系列政府官员的经济犯罪事实就是一个明证。所以说政企职能分开，不仅是企业增强活力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政府廉政的重要促进因素。

政企职能分开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要否管企业？管哪些企业？怎样管？企业中的重要干部是否要由政府来任命？如何更好地发挥企业基层党组织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就能为企业提供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良好外部环境，促进企业发展。

（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这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外部条件。目前这一工作虽已开始进行，但绝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仍存在“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即企业不仅要进行自身的生产经营，而且要负担企业职工的医疗保健、养老、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功能和义务。这些本该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的重任压得企业无法集中精力进行生产，无法放心大胆地进行企业内部改革，例如企业经营不善，理应精减机构提高效率，但由此而造成的失业人员将由谁来负责呢？凡此种种，使得企业顾虑重重，严重束缚了企业活力的发挥。因此，在企业改革过程中，一定要建立以养老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

系,打破“企业办社会”的局面,使企业能一心一意地进行生产和内部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该解雇的就解雇、该破产的就破产。这样,才能真正焕发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 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

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本质上而言,是要改变国有企业中无人负责的状态。目前我国国营大中型企业中普遍存在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无人负责的现象,这不仅使得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不善,而且造成国有资产的贬值甚至大量流失,其数字惊人,严重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落实到企业中的各阶层,把责、权、利落实到人,尽责有奖,失职必惩,严格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就其实质而言,则是要彻底打破“大锅饭”的平均分配局面。打破“大锅饭”这一主张也已经提了很多年,但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各方面因素的束缚,“大锅饭”是打而不破,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仍很严重。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就是要分配同职工个人的实际贡献直接挂钩,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在职工收入方面要敢于拉开距离、奖惩分明,从而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动力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积极性,促进企业发展。只有做好以上两方面的工作,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树立市场竞争意识,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发挥其应有的活力和作用。否则,在市场经济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是难于立足的。

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合理的、必要的存在范围”问题

之所以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前理论界对国家如何管理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着不同观点,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以求得一个妥善的、顾全大局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从现阶段看,国家不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条件来保留和支持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因此,对这些公有制经济中的大户必须有一整体考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对于那些关系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与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有企业,如钢铁、煤炭、交通、通讯、烟酒、化工、国防高科技诸方面的企业,必须大力支持和加强;对其他一些部门的国有企业则尽可放手民营、私营,经营不善者索性破产。简言之,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合理的、必要的存在范围”,就在于保证关键的少数,放开其他的多数。这样不仅有利于搞活企业,而且也有利于减轻国家不必要的负担,更好地实施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

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管理模式,由于受生产规模、原料、产品和生产本身特点以及市场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必然呈现多样化。我们认为,对不允许私人、外资插手的企业必须实行国有国营;对国家必须占主导地位的,可采取国家参股、控股方式;其他的,则大可采用国有民营等合理的经营管理方式。当前的任务,是要尽快找出一条切合我国国情的、有利解决实际问题的路子,而应避免“一刀切”,空谈甚至生搬某种标准或模式。

这里有必要阐明我们对当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看法。这一改造确实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但必须指出,和西方国家实行股份制的历史背景相比,我国的现状具有极大的异质性。西方国家实行股份制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在其实行之初,已有数百年市场经济的雄厚基础和优良条件,而且其实施目标是为了解决小规模经济的局限,谋求大规模经济效益;就实施过程和方式而言,则是私有经济的股份化。而从我国现状看,国有大中型企业规模已经够大,主要的问题是竞争不足、缺乏效率,而且其公有制属性与私有经济有质的不同。正因为这些现实条件的强烈差异,使得西方股份制的历史经验在我国现实中具有的借鉴意义极为有限。更重要的是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尤其是价格改革虽搞了许多年,但

仍存在较为严重的比价不合理问题,使得市场价格信号不能真实、及时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动。因此,盲目推行股份制必然起不到它所应起到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另外,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现在主要在于虽明晰而不落实,因此国有资产不能确保保值、增值。而盲目推行股份制易造成产权至少是部分的转移,并由此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改革中产权明晰决不能演化成产权转移,这一问题理应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警惕和重视。

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因素

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作了如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作一个初步的展望。这里所想要阐明的,是几个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因素。

毫无疑问,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首先就涉及到与经济改革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政治与经济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世界各国的改革和发展经验都已证明,没有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处处受阻,难以顺利进行。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因为经济改革归根到底是由政府工作部门来主持实施的,不改变原有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作风,必然直接影响到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而且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中国特殊的改革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企职能分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前提。不改则政府难廉洁、企业难搞活,影响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虽然如此,鉴于本文篇幅有限,而且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重大课题又决非是两言两语所能说清的,所以,在阐述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因素时,我们把重点放在经济因素,尤其是宏观经济因素方面。

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宏观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总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

这里主要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来看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问题。

近年来,理论界出现了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即认为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和经济生活的龙头,而中国作为一个穷国,消费水平低,从而严重束缚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所以在改革和发展中应当推行鼓励高消费的政策,并以高投入、高物价、高收入来予以支持;有人据此进而主张实行适度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以扩大总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和主张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1. 作为一个穷国,中国的消费水平低固然是一个重要表现,但更主要的还在于生产水平低,换言之即是总供给短缺,目前我国尚有 8000 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同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生产相对过剩所表现出的总需求不足截然不同。2. 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不可否认,但二者相比,生产应占首位,尤其在我国现阶段短缺经济条件下,生产上不去,消费也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3. 高消费在当前中国只能是占总人口极小部分人所能享受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现实。在此条件下提倡高消费、高收入只能继续扩大极少数人和绝大多数人在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上的差距,并不能反映人民的愿望和利益。4.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一定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很难避免,但如果将之作为一种必然并刻意追求的政策,则祸害无穷。因为通胀实质上是对人民征收的一种“坏税”即剥夺,而赤字财政只不过是寅吃卯粮。这些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实施过程中所导致的“滞胀”局面,我们一定要警惕,并尽可能地避免重犯类似错误。

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总供给的短缺在很长一个阶段内难以根本改观,资源相对稀缺、技术水平低、资金缺乏、人口众多但素质较低,这些不利因素都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因